

谢刚 著

萍
游
江
上

拼·译·江·山

谢刚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洪澍江上 / 谢刚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97-6219-6

I. ①洪… II. ①谢… III. ①图书—出版工作—文集

②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 G23-53 ②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1814 号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097-6219-6

定价 / 3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谢刚

传媒工作者，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9年生于山东。就读于吉林大学、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知识出版社）、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曾创办《City-Weekend》等数本杂志。2004年入中国外文局，筹建新星出版社。现任新星出版社社长、香港和平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一个行走在 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学人

■ 丁帆

与谢刚的结缘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记得是出版我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他的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年轻的“老资格”出版人，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是知识出版社社长了，老成干练、业务熟络的风格作派的确会使一般的学者刮目相看。

20世纪初年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节点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出版业面临多重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几乎与中国新时期出版业同时发育成长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我以为谢刚是最有资格来评述这个行当的。于是，在与之详谈之中，便有意询问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思潮与出版、接受之间的一些问题，从他的回答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凭谢刚对中国出版业状况，乃至制度机理的了解，如果让他来做中国出版业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之深层关系的研究课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他的聪明的才智和分析问题的深刻准确，加之看问题的宏观视野，一定会在这个当时刚刚起步却少有深

刻之论的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基于上述原因，我决定收他为博士生。世纪之交的 2000 年报考我博士生的人很多，好在谢刚考的成绩也很理想，便顺利入学。三年当中，他的论文选题经过了多次反复的调整、打磨与修改，终于成篇。在论文答辩中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毕业前，我嘱咐他把博士论文再补充些资料后尽快出版。在我认为里，作为在国内出版圈极有人脉和影响的出版社社长，出版自己的论文还不很简单？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他从知识出版社到法院出版社，再到新星出版社，一路做了几个出版社的老总，却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论文当回事，一追问，他竟然说论文和许多资料搞丢了，真乃不可思议也。但是，仔细想想，却咂出了另外一番况味：作为一个行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文人，谢刚没有像诸多官员那样为自己的政治颜面去涂脂抹粉，以极尽附庸风雅为能事，作为一个本身就是中文学科出身且又精通业务的官员，如此

低调地对待自己的学术成果，也的确是其人品的一种本能表露吧。不过，我仍然希望他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许多独到的见地出版发表出来，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可资的借鉴。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文章，除了第一篇是他论文的基本框架外（尚有许多想法和抽样分析没有付梓），其他几篇是他的论文旧作，从中可以见出论者学术品味之一斑。

谢刚是一个很有自己学术见地的文人，少年老成的他不仅有治学严谨的风格，同时也兼具高屋建瓴的观察视域，更可贵的是他具备了一种发他人所未见的学术素养，几篇论文就可见出其文献考据的功底、站在中外文化制高点上发现真问题的本领、从细微之处寻找学术突破的能力。《美丑尽在情与欲之间——论〈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一文通过对金、瓶、梅三个女性的分析，将她们“还原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历史环节，进而考察她们在文学和美学中的特殊意义，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金瓶

梅》”。为潘金莲翻案的文章甚多，但是将潘氏与李瓶儿、庞春梅一并分析，从而为其进入一个历史和美学的评价通道铺陈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由此而来的分析就比他人高了一筹。同样，对莫言作品叙事策略的分析也是我见到的对莫言叙事少有的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关键在于作者不是在“掉书袋”中发论，没有被淹死在他人、尤其是洋人之论的汪洋大海之中。分析侦探小说更是他的长项，新星出版社作为中国翻译出版侦探小说的第一大社，谢刚功不可没，其中熔铸了他对此类作品的独特见地，从这篇《阅读之前没有真相——略论侦探小说的出版》就可见论点之一斑。

谢刚的工作忙，头绪甚多，行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确不易，可是作为一个本质上的文人，我寄望他不可放弃学术和写作。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扩充自己的博士论文，当下他更有条件使其日臻完美，不为稻粱谋，只为中国出版业计，也应当有所作为。

是为序。

目 录

一个行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学人

论转型期文学与出版 1

美丑尽在情与欲之间 147
——论《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

论莫言作品的叙事策略 167

从语境看“红楼”的“真假” 179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 185
——略论侦探小说的出版

关于侦探小说 203

关于雷蒙德·钱德勒 211

后记 221

论转型期
文学与出版

绪 论

文学研究的范围不能仅限于作者与文本，也不能像韦勒克所划定的那样仅限于作者、读者、文本和现实生活，还应该关注文学发生的生产机制，从作者到文本的形成到读者的接受，不是简单、机械地承递，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参与其间。理论家们提醒我们，文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静态的供学院式解剖的对象，文学依赖于某些生产技术和出版策略，且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从出版的角度去考察文学，有助于揭示还原文学生成的真实面目。

第一节 “文学场”与“转型期文学”

研究布尔迪厄的“场”的概念，有助于对文学生成的社会环

境作深入的理解。场的理论提示我们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而不能只看到单个的有形实体，说到底，“场”就是一个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空间。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的和谐统一体是由一些相对自主的社会微观世界组成的，社会的微观世界就是各种客观关系交错斗争的空间，是符合自身逻辑的场所。这些微观世界的场，如“文学场”“宗教场”“经济场”“政治场”，就像一场场游戏，各自有它的游戏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并不是很明确，也没有见诸文字；场内的各个游戏者（拥有不同的资本和权利）或对立，或妥协，或斗争，或共谋，运用策略极力使游戏规则朝有利于自身一方发展，从而在场内占据最佳的位置。拿文学场来说，其间的权利体至少包括作者、出版商、批评者、读者等，文学场与其他场相比较，遵循标志其差异性和界限的游戏规则和逻辑，即所谓的“文学自主原则”。同时，文学场和其他场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权利场，受到它们的影响和制约，比如说“政治场”和“经济场”。但过去把这种影响理解为是直接的强加，就像力的传递那样，直接地、保持原貌地强加给文学。在布尔迪厄看来是折射和重构的，“处于一个特定的场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政客或建筑公司）从来都不是直接承受来自外部的决定的，外部决定只有在被重新构造以后，通过场的特殊形式和力量的特殊调解以后，才会影响到行动者身上。这个场越具有自主性，这些重新构造就愈加重要。”^①在外部决定被重新构造的过程中，出版起到了最大的调节作用，出版在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文学自主原则之间斡旋，参与了文学的制

① 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51页。

作，策划文学的发生、销售、被阅读的整个流程，甚至不断制作出新的、时尚的文学阅读口味。审美原则、政治原则、经济原则等到底怎样相互斗争或共谋来影响或决定文学活动的，对出版做一番细致的考察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在展开具体的研究前，我首先对“转型期文学”的概念所指以及为何把这一段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作个简单的说明。“转型期文学”这一概念现已逐渐被接受。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政府的领导和规划下有步骤进行，相对于过去政权更替、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而言，虽然也有质变，但它是渐进的，原有的文学机制和生产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文学“转型期”包括80年代后期以来较长的时段。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84年国家出版局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的出版单位要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要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出版单位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同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文学的市场化转型进行集中的、大规模的讨论，相继提出“后新时期文学”“后现代文学”等各种口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面貌，也并不是完全的断裂，新旧杂陈，多元共生。直至今日，“转型期文学”仍然是开放性的概念，没有终结。^①文学场的存在，必得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作为

^① 关于“转型期文学”的阐释，可以参见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第11页；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4页。

前提，也就是说，文学要有一定的自主独立性，这样才能构成各个权力体的生存语境，同时在外部和与其他场形成权力关系。相对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这一时期，文学场的自主性逐渐增强，相对地摆脱了政治的钳制。从1985年前后开始，出现各种类别的文学实验，如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等，不一而足，出现了一批专业的作家群；批评也热火朝天，不再是政治观念的阐释者和传声筒，而是按照文学的游戏规则呼号鼓噪，涌现出新潮的批评家群体；同时还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群体，那就是出版商和编辑群体，过去对他们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但正是他们构成了文学的生产机构，足以引领文学的走向；此外，各种文学评介机制形成和读者积极参与，使得文学在大的社会机构转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游戏规则，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而承受来自各个权利场的压制。文学场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与政治决裂，不仅如此，它在转型期还必须承受来自“经济场”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文学并不是完全自由地遵循自身的内在原则，而是承受各种场域的挤压，折射为文学场内的斗争。文学若是完全为意识形态服务，则不足以言出版，因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进入了转型期，有一定的权力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自己的选择，出版才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参与到了文学的生产机制中。出版行业是斗争聚集的场所，它必须全面地考虑读者、作者、批评家、主流意识形态等各个权力体的要求，寻找最佳有效的路径。应该说，考察图书出版与转型期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文学研究是可行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第二节 印刷时代与小说的兴起 从救国到商业化

中国近现代文学是在机器印刷时代所产生的文学表达和传播方式，这是与古代文学相较最大的区别，出版真正地介入其中。

“转型期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所以在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出版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回溯，描绘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轨迹，寻求其中的规律，有助于历史地来看待其在转型期语境中的具体表现。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分析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所列举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近代印刷出版的发展直接引发了小说繁荣，这个观点被普遍认可。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和小说的繁荣基本在同一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或者是前后相随，昭示了二者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早先的出版指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印行的杂志、新闻、报纸和书籍，至于出版独立出来，策划各种丛书、文库，乃至投资公共文化事业，是1910年以后的事情了。有必要指出，近现代的印刷技术，并不是从中国古代印刷术直接发展过来的，而是西方的舶来品。众所周知，古登堡等人于15世纪中叶发明的活版印刷技术使书籍的大量复制成为可能，对欧洲的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换起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印刷革命”，这种技术传入中国，被称为西式印刷。最早把新式印刷应用于汉字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们，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在澳门和南洋一带，后来又发展到香港、广州、宁波、福州等沿海城市，并逐步向上海集中，

建立了第一批出版社。^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新式活版印刷仅仅应用于教会内的书籍，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也未获得广泛普及，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接受这种外传而来的新式媒体的气候条件：一是没有书报发行畅通无阻的交通便利，不能形成出版赖以生存的广阔的都市空间；二是整个社会风气未开，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欲望并不旺盛，早期出版产品如泥牛入海，无法广布。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促成了思想界的广泛觉醒，受挫于昔日的藩属国激荡起民族凝聚的信心，思想改良，救亡图存，成为普遍风潮，再加上沿海城市的日益都市化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使各种信息的快速、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现代出版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引发了中国人创办报刊之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至1898年，全国有120种中文报刊问世，其中像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印数高达17000份，国内外读者约10万人之多。^②中国古代不乏专门以出版书籍为生的出版商，但用的是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方式，印刷数量极其有限，故流通范围狭窄。报刊和平装书作为新的文本材料，在外观上就与中国传统线装书不一样。报刊和平装书容量大，可以用较小的字排印；出版快，出版周期最短在一天之内；价格低，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承受。这些，有时使它们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线装书。现代出版提供了与中国传统线装书不同

①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参见第二编“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把基督教出版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前，第二阶段为1843年10月后，第三阶段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第267页。

的传播媒介，概言之，它的主要特点是：快速复制，价格便宜，流传范围广泛。传统文学大多以抄本的形式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传布，因此，决不是平常人所能染指的，文学的高雅化是必然的事情。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出现，文学获得越来越多的受众，流通的时间也更快，势必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观念产生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现代出版的襁褓中诞生的。

近代以来出版业的勃兴使文学与出版联系起来。最早的文学期刊是1872年发行的《瀛寰琐记》，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称：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尘》（一八九九）卷五云：“数年前，尝闻沪上寓公有李芋仙其人，与王紫住、何桂笙、邹翰飞、钱昕伯诸名士，先后襄理西人美查所设华文日报号曰《申报》者，复以其暇日提倡风雅，发挥文墨。”

《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创办人是英国茶商美查，《瀛寰琐记》即为申报馆所办，该刊终止后又续出《四溟琐记》和《寰宇琐记》，都是文艺月刊。邱菽园的记载告诉我们，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月刊基本是传统文人墨客遣怀怡情的去处，所刊登的消闲之作，从文体类别来看，多是被视为大道的诗词文赋，这些为文人闲来赏心的雅致玩意儿自然是无法流布的，说明早先的刊物还是古典文学的阵地。但如前所述，甲午后维新改良的风潮促成了对文学功用的新的认识，小说过去被看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如今逐渐被重视，因为其俗而拥有大量的